

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新范式 —迈向人类的共同幸福，乌托邦理想的未来实现

林子敏

摘要

本文旨在揭示资本主义体制自身逻辑的内在性矛盾，因其无法自我调节及修复致内爆效应；以及资本主义作为生态危机的元凶之一，审视及批判发展主义的模式及科学进步发展观。除此之外，在近年社会运动席卷全球各地与牵动无数被压迫者心灵的语境下，从抗争者的呼喊声与实践见证变革的可能。在社会公义荡然无存及社会失衡的状态中，拉丁美洲作为社会变革一块肥沃的土地及游击者的战场，拉美原住民传统的智慧与实际的行动向世界揭示着传统的农耕文明。拉美原住民的宇宙观，展示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发展观。最后，尝试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新范式作为替代性方案以解决资本主义结构性问题作为反思性思考，寻觅与追求人类未来的共同幸福（The Common Good of Humanity）。为此，我们必需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作全面考虑，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尊重及守护的态度对待大地母亲、重新强调生活必需的生产与改变现有的生活模式、重整集体生活与集体性社会意识、以及重新确立相互文化主义与文化价值观。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前题下，重新建构与塑造和谐社会。乌托邦理想的实现并不是梦，我们可以做出改变，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关键词 资本主义 生态危机 社会实践 可持续发展的新范式 共同幸福

引言

资本主义以强调个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及虚拟金融化作为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在阶级斗争的彰显下伴随着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在意识形态对峙的后冷战格局里，新自由主义打着‘发展’的旗帜肆无忌惮的在全球迅速蔓延且横行霸道并进行无情的噬掠，发展主义作为殖民者与特权阶级最有力的挡箭牌，对殖民地及第三世界国家的侵略暴行及剥削掠夺提供了天然合法及正当堂皇的理由。在殖民主义 500 年的历史中，生存在天然资源肥沃地区的美洲原住民人们，因而被无情残暴的抢夺以致种族灭绝、清洗，或生灵涂炭。在现今全球化金融资本的时代，高消费的行为模式支撑着泡沫化虚拟经济的运转。生存在地球上大多数的人们，因此而继续痛苦的遭受着资本主义所衍生的种种问题并付上沉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地球资源被非理性的耗用而近枯竭及大自然因作为市场的「外在成本」而受到不断破坏的情况下，生态危机已经逐渐爆发、各国相继掀起能源争夺战，以及全球暖化、生态债务的转嫁¹等问题经已被放置在世界气候高峰会的议程之上。寻找另类可持续的替代性方案，成为了各国之间迫在眉睫共同讨论的议题。

生态危机的揭示，资本主义体制自身的崩溃瓦解

近年，2012 年美国桑迪飓风、2011 年日本福岛地震、2010 年中国青海玉树、智利、海地及索罗门群岛四地均达 7 级以上大地震、2009 年新西兰南部及印度尼西亚大地震、2008 年中国汶川大地震、2004 年印度洋 9.3 级地震并引发的特

¹ 有关全球暖化的讨论，如果水不以各种形态留在土地，大部份的附带太阳能将转至感热，环境温度将会急剧上升。根据《六度》一书的说法，若全球气温上升一至六度，地球上不同百份比的生物将会灭亡。（〔英〕马克·赖纳斯；邓金娣、王云霞译；《六度—一个愈来愈热的星球》；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年）；除此之外，Lawrence Summers 教授曾《经济学家》杂志中指出有关生态债务转嫁的问题，“让他们吃掉污染”说明了有毒废物及生态债务向第三世界国家及低收入地区倾泄与转移的现象（《经济学家》；1992 年 2 月 8 日）；近年，有关碳排放贸易及监管机制等问题，已成为各大高峰会热门讨论的议题。

大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正向人类揭示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大自然资源的剥夺与自然的破坏，以及大自然所能承载能力的超负荷与不可再生。每每触目惊心、历历在目的自然灾害，都推进着各国气候高峰会的日程。可是，2012年11月的多哈气候变化大会、2012年6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2007年於巴厘岛举行的欧洲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峰会，以及2002年在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等，都一一地引证了资本主义逻辑的致命性概念及其制度结构性问题的被掩盖、避重就轻，或是泛泛之谈。发展进步观成为资本主义不断向地球无穷索取的幕後操手，快速的增长及欲望的贪婪正逐渐摧毁着地球。

自19世纪以来，垄断性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合性系统，不断增强其对普遍性事务的一切控制并紧握所有的生产系统。从20世纪70年代始，在体制结构上，生产资本逐渐转向金融资本，实体经济逐步移向金融投机。而列强各国亦由竞争性的帝国之争，慢慢形成以美国、欧洲及日本为首的三位一体集体性经济体系。直至90年代，完成金融资本全球性扩张。“普遍化垄断正主宰全球经济。所谓的“全球化”，是指它们对全球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生产系统施以控制的一系列要求。这无异于帝国主义的新阶段。资本累积重心的转移，正是收入与财富不断向垄断集团集中的根源。这些利益大部分被统领其他寡头集团的寡头（富人统治集团）所垄断，为此不惜牺牲劳工应得的报酬，甚至非垄断资本的收益。”² 实体生产投资所生利润与金融投机利益之间持续增长的不平衡、严重落差，甚至脱节，构成根本性内部不平衡与冲突。

就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而言，其对地球的毁灭性远远的大於其对人类社会所制造与贡献的创造性。其致命性逻辑为以个体为中心、追求无穷的增长与利益

² 萨米尔·阿明；黄德兴译；《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论文、摘要集；2012年12月；第111页

最大化、资本的过度集中，以及过剩的剩余资本用作虚拟金融化投机，造成体制内的内在性矛盾而不能自我调节及修复致产生结构性内爆。³根据甘地所说，世界富裕得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却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贪婪。《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⁴里写道，“他们用尽一切方法，让我们相信：购物是公民的义务，掠夺地球的自然资源有利于经济发展，从而实现我们更崇高的利益。”其实，相信依靠高消费以维持高增长的生态平衡是一种愚昧和迷信，一直天真的认为快速的增加与商品化的经济逻辑最终会解决贫穷及治愈地球。“西方主流理论的所谓发展，意含两次大战之后在解殖运动中形成的发展中国家被纳入西方发展主义路径。其内在的前提，是把西方凭借殖民主义扩张构建的现代化当成唯一发展目标，并且遵循西方资本主义的既成模式。”^{5 6}而被殖民国家、部分拉美及非洲国家更是不

³ 本人有幸在萨米尔·阿明教授来华参与由西南大学（重庆）、中国人民大学及香港岭南大学主办的第二届南南论坛及生态团期间，与其进行了多次深入访谈探讨有关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内爆等议题。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1931— ），全球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活跃的左翼社会活动家，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1955 年出席周恩来总理所推动的万隆会议，1957~1960 年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研究部主任。1963~1970 年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担任教授。1970~1980 年担任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所长。1980 年起担任第三世界论坛主席，1997 年起担任另类实践世界论坛主席。其著述主要有：《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不平等的发展》（1973）；《不平等的交换与价值规律》（1973）；《帝国主义的危机》（1975）；《帝国主义与不平等的发展》（1976）；《价值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1977）；《历史上的阶级与国家暨当代危机》（1979）；《今日阿拉伯经济》（1980）；《脱钩：为了走出世界体系》（1985）；《欧洲中心论批判》（1988）；《混沌帝国》（1991）；《心路历程：半个世纪的审视》（1993）；《世界一体化的挑战》（1996）；《时代旋律的批判》（1997）；《资本主义的幽灵》（1998）；《自由主义病毒》（2003）；《为多极世界进言》、《资本主义危机的终结，还是资本主义的终结？》（2010）、《世界历史”一种南方的观点》（2010）（2005）等数十本。

⁴ [美] 约翰珀金斯；杨文策译；《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 年 12 月，第 11 页

⁵ 《首届世界可持续实践南南论坛》；第一届可持续南南论坛会议手册；第 2 页；当我们每一个地方都追求一个民族国家富强、某一种发展想象的时候、某一种进步标准的时候，它造成我们走某一种的路径。

⁶ DELGADO G., “Metabolismo social y Futuro común de la Humanidad: Un análisis”, Norte-Sur, Rosa Luxembourg Foundation, Brussels, 2011 (Capital, Vol. 1, P. 637-638, cited by Gian Delgado); 除此之外，Cynthia McKinney 教授曾撰述有关殖民主义和发展主义的议论，“西方数十年来掠夺非洲的财富，并且默许，甚至协助屠杀非洲人民……一方面不遗余力营造这个神话：非洲今日的问题大部分是非洲人造成的。我们都听过西方辩称：非洲问题源于腐败的政权、由来已久的种

断的向宗主国靠拢，依附其经济体系而生。可是，这显然是会终招失败而自我腐蚀的。⁷ 爱因斯坦的名言曾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是无限的，一是宇宙，二是人类的蠢愚。而愚蠢和慷慨的不同是，慷慨是有限的。霸权国、寡头垄断国家、发展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及南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的拥抱金融化资本主义，在追逐债务的竞争场上相互角力而终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虚拟化的汽球终在爆破的一天，2008 生金融风暴拉开了序幕。

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普遍性资本主义体系不断的向世界每一处扩张，蚕食每国每一根的动脉血管。“这个体系一般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实际是普遍化资本主义系统，它是全球化(帝国主义)和金融化(为自我再生产所需)。这个体系正在我们眼前内爆。它明显不能克服其愈益严重的内部矛盾，注定要继续如脱缰野马，到处践踏。”⁸「华盛顿共识」已失去当初作为一套经济理论，对拉美国家及东欧转轨国家的制约及实际的意义。西方国家致力营造的发展幻想，随着经济萧条而逐渐幻灭。“发展主义一个重要信念，便是认为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快速增长又比缓慢增长好。这种将“发展”等同“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等同美好生活的信念”，本是特定的历史产物，但却被看作为普遍的真理，支撑着整套发展主义的话语，将丰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约化成单一的向度，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⁹ 其实，全球化的推演，也是全球媒体不遗余力在妖魔化落后国家，并竭力掩饰先进国家为她们所带来的苦难，然后大肆宣扬由美欧日

族仇恨、不成熟的人民。可是我们知道这是谎言。……非洲苦难的核心，在于西方，尤其是美国，意欲掠夺非洲的钻石、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宝贵资源。”；我们每一个地方都追求一个民族国家富强、某一种发展想象的时候、某一种进步标准的时候，它造成我们走某一种的路径。

⁷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引出大量的史证，阐释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对被殖民国的噬掠。在殖民 500 年的历史里，宗主国对被殖民国家的人们造成永不磨灭的伤痕和烙印。但却在新自由主义的包装下，被陈封了的历代痕迹被重新书写作为发展的旗帜和口号。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王玫等译；《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

⁸ 萨米尔·阿明；黄德兴译；《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论文、摘要集；2012 年 12 月；第 111 页

⁹ 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 2 页

主导的自由贸易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的蔓延性过程。

资本主义的崩盘呈现末日的状态，这是体系的终结、文明的末日，还是人类的末日呢？齐泽克则在其新书《末日生存》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终结会引致生态的危机、体制的不平衡致引发全球性的原材料争夺¹⁰，以及阶级分化深化并爆发排外性的种族冲突和社会暴力。再者，对增长的无限追求、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对信息科技的垄断、对资本市场的操控及各国军事上的竞赛，更是将‘发展主义’推上极致和危险的边缘。更重要的是，人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被扭曲，而人与自然之关系被异化分离。“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启动了大自然及人类之间人为的及机械性的分离，以及再生性循环生态系统永久性的受损。¹¹按资本累积过程的定义，新陈代谢的破裂就是人类为满足其需要而与地球发生的物质转换，最终导致非理性的实践浪费及破坏。”¹²由此可见，垄断性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及生态的层面上，都是不可持续的。

来自地球上多数人的抗争，世界各地热火凝结的社会运动

面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内爆及所衍生的种种问题，来自地球上多数生存在警戒线与面临温饱挑战的人们为了基本的需要，以各种的形式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全球性的抵抗。在全球中有无数的正在实践或成功的社会运动案例，带给世界上的人们无限变革的可能与想象的空间。印度的妇女互助银行（SEWA）、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中国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世界社会论坛、另一个达沃斯、在里约+20 举行时 30 万民众参与的民间社会论坛等等，均凝结了万千人们

¹⁰ 体制的不平衡致引发全球性的原材料争夺，是继对黄金、黑金与蓝金的抢夺后的新一轮争夺战。

¹¹ 据资料统计，至 2050 年，全球对自然资源的消费将会增至现今的三倍达每年 140 亿吨。砍伐森林、农业、城市化及人为性迁徙已影响地球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 40%。自 14 世纪以来，生态被视为「外在成本」不断被压榨而再产生废物浪费，致生态失衡。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

¹² 弗弘索·郎达、巴姬·黛芭着；李俊妮、周思中译；《从「公共财产」到「人类共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布鲁塞尔办公室出版；2011 年 11 月；第 18 页

的力量，各人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地缔结出拥有新价值核心的抵制运动。没有革命的理论，只有革命的行动，结合人民抗争的经验与现实层面理论思考，从行动实践中见证变革的可能。

近两年，直指资本主义体制致生态灾难及金融危机的控诉，初登国际舞台并进入媒体的视野之中。世界各地不同社会群体都为了同一个需求——“基本生存/生计”而作出抗争，以大多数人的名义呼喊生命与命运，以及人类的未来。¹³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全球抗争的人们便以“我们是百分之99%！”作为口号。除此之外，原住民运动在国际的抗争舞台上继续跳跃出漂亮的舞蹈。原住民利用传统的集体民间智慧与创作的智慧¹⁴，透过高度组织的动员方式，结合在地的生态圈与现实需求，在全球媒体的视野中突围而出。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秘鲁的普诺起义、南美洲原住民的地方自治运动，以及波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地的原住民运动，均牵动着人们的心灵与盼望。在绝望挣紮的萨帕斯原住民们，高声呼喊“受够了就是受够了！（Enough is enough!）”。¹⁵而在秘鲁普诺起义的原住民们，则在焚烧国会时打破在场来自全球所有媒体的一切摄影器材，以全面阻碍媒体报导的方式做出绝地反抗，以反对加拿大跨国矿业公司的入侵及对当地原生态所将要带来的破坏。如文章开端所言，追求增长是一种疯狂和愚蠢的行为，而污染性产

¹³ “更值得进行深入分析的问题当然是构成另类世界运动的新颖之处：它反对资本主义的变体——新自由主义，并对民主有着巨大的热情。当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界定这一点。但是，发展与民主并不是始终融洽相处的。今天，第三世界的运动幻想一种有利于发展的民主，渴望自力更生、更为人性、包容和参与的发展。这样，我们就必须严肃认真地重新定义民主与发展，赋予其新的含义。”（刘健芝、萨米尔·阿明、索瓦·浩达主编；《抵抗的全球化（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911页）

¹⁴ “对殖民统治500年间的玛雅原住民说来，当他们用面具遮住了自己的容颜，他们才第一次成了美洲、乃至世界传媒的焦点；他们才不再是一段古老而神秘历史的遗民，现代社会愚昧而麻木的奴隶；而是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政治力量，是向现代世界展现并阐释何为尊严的人群。用马科斯的表述，便是“我们是武装起来方才获得倾听，遮住面孔方始获得注视，隐匿了名姓方能获得命名的人们。”那面具是一面镜，映出你心中的反叛的呼唤：“在面具背後，我们就是你。””（戴锦华、刘健芝主编，《蒙面骑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¹⁵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宣战书中最为铿锵、也最为著名的宣告。（戴锦华、刘健芝主编，《蒙面骑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业及生态债务向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地区转移更是可耻的举止。近年，原住民地区的原原生态面貌饱受跨国公司的侵扰。根据 Thomas Greco 的说法，债务必须以创建增长的需要为支撑，这样，迫使人类破坏孕育万物及生命的地球循环系统是无法避免的。另一名生态经济学家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Richard B. Norgaard 教授指出，在某程度说，富裕国家是在牺牲穷人的利益之上筑建的。穷人承受沉重的债务，是致其贫穷的原因。

庶民的苦痛埋在历史的进程中或被重新书写，使享有特权的人在结构性的不平等的机制中处在天然的位置上获利而不需承担成本。按统计资料指出，美国西欧日本平均每人耗费的自然资源，是第三世界居民的 32 倍，这样，产生的废物也多出 32 倍。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亦指出，世界上 20%的人口消耗了全球 80%的资源。可见，资本主义体制内部性的不平衡，造成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们处于被压榨的弱势位置之上。在某一个意义上，无论是女性主义运动、原住民运动、同性恋传递运动，或者低层人士各种的运动，其实是一致的，关键在于共同采取的某立场——一种以低层人士、被剥夺者、被牺牲者及受害者被整个社会现代化、工业化¹⁶边缘化的立场、一种被推到边缘，甚至无以为生的一种呼喊、一种对社会制度的批判，以及一种走向公平理想社会常有的价值观。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选择：是选取站在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深化下被牺牲、边缘化、排斥的大多数人的的一方，还是站在不惜一切维护现状、维护其阶级利益的社会权贵和中产阶级的一方。前者不但被剥夺了幸福，还被夺去了维持温饱的生存条件。后者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逻辑推动下，不仅自满于以“现代美式生活方式”为准则的现状的追求，更是不断干出种种暴

¹⁶ 在现代工业化的进程中，无数的人们被迫到生死的边缘。在中国，农民虽然生活得很艰难，但是在国家扶平政策的帮助下，不致到达饿死的局面。可是，在非洲，或者很多其他的地方，因为工业化进程而饿死或出现人口大批死亡或大规模迁徙的情况累见。这种情况，也算是整个现代化发展的恶果。

行…实际却是既得利益者中饱私囊的恶行，进一步掠夺牺牲那大多数活在不公义处境的庶民穷人。”¹⁷其实，“这不是简单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不是强势的主体压迫弱势的主体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我”跟“他者（非我）”的关系，而是共处一个大熔炉中的强势与弱势的关系…植根於主导的现代理性的二分法框架中，以致庶民历史研究者无论如何渴望能聆听庶民的杂音，也会变得有心无力。”¹⁸庆幸的是，在弱肉强食的病态社会中，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们，正站在正义之上处於世界角落的某处努力的为美好的未来而抗争之中。¹⁹“最黑的夜，最亮的光”。被幽灵化的人们，在被遮蔽的黑暗中如星星般发亮。“爱”，抗争者需要爱。引用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一句名言“对任何不公而发抖，引导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

改变、变革、革命—聚是一盘火散是满天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聚。革命的路是充满荆棘、未知与慢长的，唯有摸着石头过河才能悟出实践的经验。在资本主义体制运转的逻辑及民族国家独立建国的历史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及被殖民国家的人们被置在最末端及最低层承受着恶果的缠绕。在错中复杂的权力关系之中，如何审视社会运动与变革者所能扮演的角色与功效呢？在媒体的渲染

¹⁷ [比] 弗朗索瓦·浩达著；黄钰书、黄君艳、安蔚译；《作物能源与资本主义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第006页

¹⁸ 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¹⁹ 有关社社会运动的问题。“至於“抵抗与斗争集中汇聚在同一层面上”，这一点却远远没有实现。这个运动仍然是“另类方案的简单总和”。它并不需要另类的、唯一的思考方式，而是可以将不同的变体嫁接其上的动员方案。我们必须持续努力寻求汇聚，降低分裂的风险。”（刘健芝、萨米尔·阿明、索瓦·浩达主编；《抵抗的全球化（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912页）还有，关键的是，理论层面的建设。在话语权创造上，有更多的能动性。“我们的语词是我们的武器。“可以说，萨帕塔运动的12年，是武装斗争的12年，是另类政治实践的12年，同时是语词战争的12年…这也是萨帕塔运动的外在“悖论之一：一场持枪蒙面为其特徵的武装起义，却以文字语词为其主要且基本的武器；拉美游击战史最新一页…充满了後现代文化（甚或後现代文化游戏）的印痕”。”（戴锦华、刘健芝主编，《蒙面骑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页）

下，社会运动与变革被政治正确化或妖魔化。在宏观的考量下，社会实践彰显得很被动与无力。其实，在实践中摸索才是实时行动的表现。通过面对当前的问题，尝试改变社会现状。改朝换代式的革命是不切实际的，如何从生活中慢慢改变自己及做出反思才是最重要和宝贵的。在此，引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科学运动的一段话，“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政府，不是什么，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自己的贪念，我们自己无限的欲望，很多时候的欲望得不到满足。”²⁰ 在世界整个商品的逻辑推动之下，个体变成某一种商品追求的消费者。个体在消费中失去理性的判断，在欲望的海洋中迷失方向。因此，我们必需作出改变。甘地曾说，应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自己改变自己生活的习惯开始，走到一个简朴的生活，走向一个能够舒适、简单，但是能够安全的生活。他相信，只要印度每一个人自己种植棉花，自己织布，穿上自己织的布，这就是对抗美国殖民制度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当时甘地也非常自豪地说，他是怎样在他叔父那里学到织布的。在他织到一块小的布并穿在身上后说：「我是反抗帝国主义，反抗美国殖民主义的一个战士。」可见，甘地这位战士不是拿起武器，而是在最基本的生活上掌握社会的发展。其实，减少消费本身就是对资本化、商品化一个最好的批判。并在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中，以本地生产与本地消费以抗衡资本与商品的集中化，以及学习简约、约束、节约的生活态度以免堕进全球化资源不可求输与生产力不断提高²¹的陷阱之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每一个人心中的渴望，关键在于跟土地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保持尊重、爱惜与保护之情，让美好的自然环境世代相传。

对大地之母的守望，人类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

²⁰ “如果你想唤醒全人类，你必须先唤醒全部的你。如果你想消除世界上的痛苦，你必需消除黑暗与负面的你。是真的，自我的转变是你所能给予的最伟大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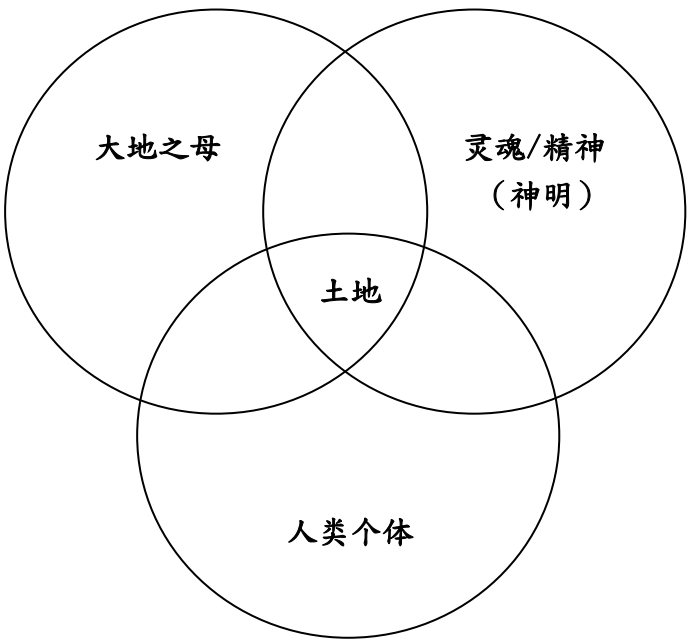
²¹ 正如马克思所说，因良好的生产关系致生产力能不断提高，个体能因此致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话语。

借鉴原住民有关人与自然之间的宇宙观，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是一种与生俱来、自然流露、与心感应的生活哲学。在生态、社会行为与文化价值的话语里，“秘鲁普诺艾马拉村落的人们相信，所有生灵的生命都是重要的，因此我们的生活建立在与周围的生灵和谐共处的基础上，我们将维护农业物种多样性视为首要任务，专注于土豆、蚕豆、昆诺阿藜、大麦、燕麦等物种的播种，栽培方式—每种物种都有其独特之处。狂欢节庆时，我们祭拜动物、祭拜神明、祭拜种子，因为它们都是构成我们粮食主权的一部份。”²² 在艾马拉村落生活的原住民们都认为，生命是相濡以沫的，所有人都是生来平等的。大地母亲泛指所有给予生命的生命共同体，所有的灵魂、生物、个体共存在一个由大地母亲所养孕的自然环境之中，在共同建构的美好社区里和谐共处，世世代代繁衍下去。在艾马拉原住民的宇宙观里，呈现了以万物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念，一种依附于土地，自然万物（大地母亲）、灵魂/精神（神明）与人类个体之间如海螺状交织的有机互动性体系（见图一）。地球间一切的生命体都有生存的权利，故此，相互间必需以平等的关系共处并予以尊重。此对应及冲击着以人类个体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性宇宙观，以及以此为逻辑的资本主义体制核心价值。信仰支配着个体的行为，故之民族多样性的体现²³。在艾马拉原住民的宗教信仰里，世代一直保持以家族为单位的祭祀。透过对狂欢节，使自然与个体之间构成跨文化的互动。教育下一代如何聆听自然、与自然对话、感受自然与触摸自然是长辈对后辈的任务，也是责任。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务，均按照自然的法规来进行处理。如农业生产，会依照传统历法严格进行。保持生态多样性是艾马拉原住民保证粮食主权的重要策

²² 埃利安娜·阿帕萨；《秘鲁高原上的食物主权和人民福利》；香港翻译组译；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论文、摘要集；2012年12月；第158页（注：本人有幸与PRATEC派遣原住民代表埃利安娜·阿帕萨在第二届南南论坛生态团与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期间进行三次深入访谈，探讨秘鲁普诺原住民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宇宙观。更多的访谈内容有待整理，整理后会放置在博士论文之中。）

²³ “在习得我们生於其中的文化并将它一代代传承下去时，我们就是这种文化的载体。鉴于每个民族通过对它信仰的内容代代相传，维持它的基本面貌，文化逻辑实际是社会人的基因，由此产生人的文化性。文化事实分为两类：出于社会秩序需要的一类具有强制性，另一类属于个人自由意志的范畴。在这两种情况不，信仰都支配着行为。由此产生了人的社会性。”（蔡华；《人思之人》；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

略，而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条件与环境是达至可持续生活的唯一路径。



艾马拉族原住民的宇宙观（图一）

在第一届南南论坛上，大会发表了关于南方国家生态文明方面的“3个S”基本主张，意思指只有维护资源环境主权（sovereignty）、加强南方国家的社会合作(solidarity)，才能逐渐促使世界回归以最基本的一可持续人类安全(security)为前提的生态文明。近十年，资源环境主权问题日益严重。在全球化金融资本的全面扩张中，自然资源被资本化使用。发展国家对境外资源的需求急剧持续上升，而引致大规模的暴力性掠夺。据统计资料，“地球大概在2010年8月的中旬已经耗尽了它自然地自我更新的能力。”²⁴ 抢先掠夺自然资源是未来各国的首要任务，维持其国民所需与国家建设的首要条件。“戴亚克辛斯（Wim Dierckxsens）评论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不但倾向剥夺世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它甚至毁灭环绕我们的自然生态（2001）」”²⁵在虚拟化泡沫爆破使全球经济滑落引致产业转型，以及能源危机掀起全球性争夺能源的情况下，部份原住民地区逐渐丧失对资

²⁴ 弗弘索·邝达、巴姬·黛芭着；李俊妮、周思中译；《从「公共财产」到「人类共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布鲁塞尔办公室出版；2011年11月；第12页

²⁵ 弗弘索·邝达、巴姬·黛芭着；李俊妮、周思中译；《从「公共财产」到「人类共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布鲁塞尔办公室出版；2011年11月；第14页

源主权的控制，或在资源管理政策决策权与能动性上大受压抑。其次，粮食与能源的私有化、现代技术对种子与化学肥料的控制，都严重的敲起人类安全的警钟。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与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地球难以承受的阶段。正因及此，大自然的权利与生物的多多样性的问题在农业文明时代後，重新进入社会公众的眼帘并引起国际间的关注与议论。

“2011 年在科恰班巴（Cochabamba）举行的气候高峰会，许多文本（包括会前的预备文件及会上不同团体及个人的发言）均超越了「大地之母」这意象的比喻性质，而赋予她有能聆听，能回应及能被爱等人类生命特质—及由此，她也有属于她的权利。最终的文件提出重新评估普及的智能及先祖的知识，呼吁我们「确认大地之母为生命体，而我们与之有着不可分割、互相依存、互为补足及灵性的关系」。透过许多原住民的宇宙观框架，文件强而有力地点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强调了这关系本身的母性（女性）特质。”²⁶ 除此之外，“联合国大会主席戴斯科托（Miguel D’Escoto），在 2009 年便於其离职演说中，提出「大地之母与人类普遍宣言」。同一届联合国大会亦於较早前由 192 个国家一致通过设立「大地之母日」，当中包含着人乃是大自然一部份这观点，而这两者应构成共生而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²⁷ 人类作为社会实践的中介，不同国家、种族、阶级的人们都应对地球负上应有的责任与共同保护。

后资本主义新范式的建构，恢复传统的生态文明

自然环境作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外部成本」已遭受破坏，人类生命安全成为体制成本转嫁的对象饱受威胁。在现今后冷战之后的时代里，建构一个冲击资本主义体制与根本性方向转变的新范式被呼唤。“修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功能障

²⁶弗弘索·鄔达、巴姬·黛芭着；李俊妮、周思中译；《从「公共财产」到「人类共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布鲁塞尔办公室出版；2011 年 11 月；第 17 页

²⁷弗弘索·鄔达、巴姬·黛芭着；李俊妮、周思中译；《从「公共财产」到「人类共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布鲁塞尔办公室出版；2011 年 11 月；第 16 页

碍、宣传绿色资本主义、监管金融市场、以发放援助的方式对抗贫困、制定越来越军事化的安全系统以及惩处异见者，都只是调适现行制度的方法。”²⁸ 新范式因将拥有多样性的本质以能让不同可能的形式共冶一炉，在制度性过渡所创造的有效互动空间里相互碰撞。重新建构国际主义以对抗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话语阵线、重新建构国际可持续的地方创新、在南南的认知基础上重新建构南北之间的对话、重新制定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国家模式或社会政策等等，均为开放性的议题与可能性的实践。“回应当代资本主义内爆的历史时刻，南北世界的激进左派需要大胆提出可以替代这个系统的政治构想。这个历史时刻需要大胆和彻底的另类替代作为惟一有效的回应。它要能推动工人和人民奋起反抗，击败对手诉诸战争的策略。建基于对当代真实资本主义的分析，这些构想需要直面我们要建设的未来，舍弃对过去的眷恋，打破身份认同或共识的幻象。”²⁹ 在后资本主义的年代里，一切方案都是可能被接受或议论的。在意识形态话语尚未建立的前提下，在制度性过渡中观察与实践多样性的可能，推进革命的日程。

生态文明作为后资本主义新范式的重要面向，能诱发具有生命力的知识生产与自主创新。生态文明被喻为人类的文明，是一种共有的生活方式、一套有别於生产的价值系统，以及一种人与自然合谐共处的状态。古老传统的经济智慧与生活经验，在现行超越地球可承载能力的制度体系中被摒弃。在有限的自然资源抢夺及置於拥挤的有限自然环境中，地方性自主创新无法在旧有生产力竞赛的模式里应运而生。面对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必需创造以在地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农村作为支撑与劳动生产单位，重新激活、创造与分享有关生命价值的讨论与话语、重新建构新的社会体制架构、新的知识类型，以及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价值系统。人民力量作为新的历史主体，有助传统农耕文明的重新复苏。千千万万的

²⁸ 弗弘索·郎达、巴姬·黛芭着；李俊妮、周思中译；《从「公共财产」到「人类共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布鲁塞尔办公室出版；2011年11月；第5页

²⁹ 萨米尔·阿明；黄德兴译；《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第二届南南论坛文集；2012

南方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农民与工人们，正努力的捍卫土地的主权，以传统的智慧与经验尝试退耕还林、丰富生物的多样性以恢复农耕文明。在资本主义体制崩溃的历史进程之中，共同等待一个拥有能包容更多面向及更多元的体制建立。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政策的现实实践层面上，有益於人类的发展。

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无法选择的选择的地步，亦即不可能再有选择的末日了？还是，处於黎明前的黑暗，在充满幽灵和鬼魂的灰色地带，闪耀着人们的希望，亦即在绝望的挣紮中等待着人类下一个春天的到来？在黑色与白色之间存在的灰色危险空间，赋予了我们富有创造力的变革的可能。正如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³⁰所讲述的文本游戏一样，作者与读书在文字的迷宫中迷失，游荡在极乐的世界之中而达致完美的沟通。究竟在充满谎言效果的意识形态格局里，人们又能如何呼喊着他/她们的未来？面对末日世界的到来，又如何做出创造另类的可能实践呢？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心中存在着一份追求与渴望。我相信，站在呼吁和呼喊的立场之上，个体之间能够共同的创建以新范式引领的美好未来。爱因斯坦曾言，我们不能以我们所创造的相同思维来解决因此而生的问题。在意识形态的幻觉之中，我们必须重新建构新的范式。

谋求共同的幸福，乌托邦理想的实现

³⁰在文学中，「作者死了」等同于「人之死」及「主体之死」，文本成为各种引文的拼贴场所。如何审视作消失所留下的空的空间？空间的概念「读者之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读者是各种书写文本拼贴的见证者和实施者，参与写作，完成最后的写作程序。其实，这是错误的。「作者之死」并不等如「读者诞生」，这是一般人对罗兰·巴特的误解。作者死了，读者同样随之而死。读者被文本的文字所玩弄而死亡。读者以为自己明白，但是，其实，一点也读不通。进入了文本的迷宫中，不能逃脱而死。这与社会没法沟通，但这是最能够达到极乐的境界。因不会再困在沟通的框框之中，这才是与文最完美的沟通 (perfect communication)。文本是「可写而不可读」，可以给读者诠释而不能阅读作者的意义，意即在达到极乐的境界时，会产生缺憾感，把逻辑矛盾中的悖谬(Paradox)推向极端。满身伤痕，自寻死路，就是极乐的最高境界。生生死死，死而复生。

人类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新阶段，建立以此为导向的新范式。物质文明的时代将告终结，人类共同构建以共同幸福（Common Good of Humanity）为核心价值的体制。“它考虑到数以百计预示人类共同利益的新典范：即人类共善，亦即具备无穷的文化表达，及在一个公正的社会跟自然和谐共处——换句话说，就是呼吁一个值得致力投身的乌托邦。”³¹ 根据 Michael Hardt 教授所言，真正创新性的转变来自对文明模式的重新调整，而成功的关键在于个体在减少对原材料耗用的前提下对幸福感的提高。在这问题上，更多的是定性及质上的转换。而重新想象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一套替代性另类管理共同财富的机制³²。其实，在原住民的宇宙观里，「幸福」与社区集体性生活紧紧的扣连着。如上文对艾玛拉族原住民宇宙观所分析的是一致的，大地母亲、灵魂与人类个体在土地之上建立如海螺状的和谐关系，而社区作为集体生活的单位承载着一切的社会文化事实。“对于「大地之母」（Pacha Mama）、盖楚瓦人（Quechua）的「过好活」（buen vivir），及艾玛拉族（Aymara）的「共同好好过活」（living well together）的参考便属于这个范畴。两者均是许多原住民的原初基本概念；在不同的具体历史处境，它们都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宇宙观，亦代表着尊敬大自然及共享集体生活的实践。”³³

正因及此，我们必需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作全面考虑，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尊重及守护的态度对待大地母亲、重新强调生活必需的生产与改变现有的

³¹ 弗弘索·邬达、巴姬·黛芭着；李俊妮、周思中译；《从「公共财产」到「人类共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布鲁塞尔办公室出版；2011 年 11 月；第 5 页

³² 补充资料：“全球公共信托” 四项条款：一是保育生态多样性及完整性、可持续公有共享财富管理应该在全球范围内都被确立为是公共信托的权利。承认小区具有自然资源的根本所有权 (radical title) 或绝对所有权 (allodium)；二是限制全球化贸易与金融机构的权力，将公有共享财富的某些层面从贸易体制中排除出去 (缩小全球化贸易协议的范围)；三是强化多边环境协议的权威；四是确立和加强能有效保护公有共享财富的托管协议。

³³ 弗弘索·邬达、巴姬·黛芭着；李俊妮、周思中译；《从「公共财产」到「人类共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布鲁塞尔办公室出版；2011 年 11 月；第 17 页

生活模式、重整集体生活与集体性社会意识、以及重新确立相互文化主义与文化价值观。在重新定义文化价值观方面，值得深入反思的是，在大众拥抱资本主义文明核心价值的同时，在西方的神话中个体逐渐丧失了自我表述的权利。那么，如何在霸权布的话语结构中重新定义核心价值是重要的。在被再现与诠释中，重新定义“正义”、“公正”、“平等”、“希望”、“理想”、“梦想”、“快乐”与“幸福”。以上各种的文化价值是构成美好生活的元素，在不断的重新定义中反思生活的真正意义。乌托邦的追求并不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和举止，其实，是人类向前迈进的理想与动力。“关于乌托邦，爱德华度，加瑞安奴写到：「我向前走两步，它却移开两步。我向前走十步，但水平线又后退十步。我永远都可向前走，但我也永远无法达到。乌托邦有甚么作用？正是：为了向前迈进」(引自 Maurice Lemonine, 2010)’³⁴乌托邦理想的实现并不是梦，我们可以做出改变，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³⁴弗弘索·邬达、巴姬·黛芭着；李俊妮、周思中译；《从「公共财产」到「人类共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布鲁塞尔办公室出版；2011年11月；第24页

参考资料

〔法〕萨米尔·阿明；黄德兴译；《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论文、摘要集；2012年12月

〔比〕弗朗索瓦·浩达着；黄钰书、黄君艳、安蔚译；《作物能源与资本主义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

弗弘索·邬达、巴姬·黛芭着；李俊妮、周思中译；《从「公共财产」到「人类共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布鲁塞尔办公室出版；2011年11月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王玫等译；《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秘〕埃利安娜·阿帕萨；《秘鲁高原上的食物主权和人民福利》；香港翻译组译；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论文、摘要集；2012年12月

〔英〕马克·赖纳斯；邓金娣、王云霞译；《六度——一个愈来愈热的星球》；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

〔美〕约翰珀金斯；杨文策译；《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12月

刘健芝、萨米尔·阿明、索瓦·浩达主编；《抵抗的全球化（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戴锦华、刘健芝主编，《蒙面骑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蔡华；《人思之人》；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首届世界可持续实践南南论坛》；第一届可持续南南论坛会议手册；

DELGADO G., “Metabolismo social y Futuro común de la Humanidad: Un análisis”, Norte-Sur, Rosa Luxembourg Foundation, Brussels, 2011